

# 埃里克·麦克卢汉媒介环境学研究述评

梁颐 唐远清

## 摘要

不幸于2018年5月18日辞世的加拿大媒介环境学家埃里克·麦克卢汉，是一位享誉国际、屡获殊荣的传播学者。或许是因为其父亲马歇尔·麦克卢汉太过耀眼，或许是因为其学术研究建立在其父亲学识的基础上，他没有获得应有的学术尊重。其实，埃里克在媒介环境学领域有着独创贡献，值得进行专门研究。在埃里克辞世一周年之后，本文对其媒介环境学研究进行一番述评，以缅怀其功绩。本文认为，埃里克的主要业绩有：分析了媒介环境学研究今后应关注的问题；与亚里士多德决定因果观相联系的媒介研究，导向技术决定论“稻草人争论”的终结；积极参加学会事务，号召媒介环境学者立即行动。

## 关键词

马歇尔·麦克卢汉、决定原因、文艺复兴、技术决定论

## 作者简介

梁颐，河北大学—中央兰开夏传媒与创意学院讲师、传播学博士，北美媒介环境学会会员。电子邮箱：yliang17@uclan.ac.uk。

唐远清，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导，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特聘教授。电子邮箱：tangyuanqing@163.com。

本文为海南省意识形态与舆论研究基地课题“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研究”研究成果。

## The Review on Eric McLuhan's Media Ecology Research

LIANG Yi, TANG YuanQing

##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renowned, award-winning Canadian media ecologist Eric McLuhan died on May 18, 2018 unfortunately. Perhaps because his famous father Marshall McLuhan, Eric didn't get proper academic respect. In fact, Eric made original contributions in media ecology. His work deserves special research. On the occasion of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Eric's

death, this article reviews his achievement of media ecology studies.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Eric's main achievement includes: analyzing issue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future; combining media study of Aristotle's formal cause that would lead to the end of the "straw man argument"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participating in MEA's affairs actively and calling on media ecologists to act immediately.

### Keywords

Marshall McLuhan, Formal cause, Renaissance, Technology determinism

### Authors

LiangYi is a Doctor of Communication, member of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and lecturer of School of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of Hebei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Email: yliang17@uclan.ac.uk.

Tang YuanQing is a doctoral supervisor and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f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tangyuanqing@163.com.

This paper is a result of "Innovative Research on Ideological Work in the New Era" funded by the Research Establishment of Ideology and Public Opinion in Hainan province.

加拿大媒介环境学家、多伦多哈里斯艺术学院主任埃里克·麦克卢汉（Eric McLuhan，以下简称“埃里克”）博士不幸于2018年5月18日辞世。埃里克是一位享誉国际、屡获殊荣的传播学者，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多所大学任教。北美媒介环境学会（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简称“MEA”）在通告埃里克逝世的信中指出，埃里克在文学、感知、高速阅读技巧、传播理论、媒介、文化、埃及古物学以及文艺复兴的性质结构等广泛的学科领域有着40多年的教学经验。

众所周知，埃里克是大名鼎鼎的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以下简称“马歇尔”）的儿子，埃里克的学术背景和他父亲马歇尔相似，他1972年在威斯康星州获得传播学学士学位，分别于1980和1982年在达拉斯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sup>1</sup>他的学术研究也往往和其父亲联系在一起，或许是因为其父亲太过耀眼，或许是因为其学术研究建立在其父亲学识的基础上，他没有获得应有的学术尊重。<sup>2</sup>但其实，他是当今媒介环境学界公认的成果颇丰的媒介环境学家。国内学界对埃里克的研究不多，除了一篇郭镇之教授1999年对他的访谈文章，再没有主题文章对他进行研究。事实上，埃里克在媒介环境学等学术领域有着独创贡献，值得进行专门研究。在埃里克辞世一周年之际，本文对其媒介环境学研究进行一番述评，以缅怀其功绩。

### 一、讨论文艺复兴，提出媒介环境学今后应关注的问题

1964年以来，埃里克的研究和思考以书籍、杂志和期刊论文的形式发表，关于媒介、感知和文学，他除了发表论文，还出版书籍，包括三本影响深远的著作（和父亲合著）：《媒介定律：新科学》（*Laws of Media: The New Science*，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88）、《传播理论》（*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汉普顿出版社，2011）和《媒介和决定原因》（*Media and Formal Cause*，新诗出版社，2011）。<sup>3</sup>当今活跃的媒介环境学代表人物之一、媒介环境学会第一任会长、现美国福特汉姆大学教授兰斯·斯特雷特（Lance A. Strate）认为，埃里克是一位优秀的学者，研究领域覆盖传播学、心理学、修辞学等，当然包括媒介研究。<sup>4</sup>在媒介研究中，埃里克结合文艺复兴讨论了媒介环境学研究今后应关注的问题。

埃里克谈到，“文艺复兴”在1845年首次出现在英语中，与“文艺复兴”同时出现的是电报的发明<sup>5</sup>。电报技术引发的文艺复兴今天依然存在，在埃里克看来，文艺复兴作为一种由媒介技术引发的“边界现象”，是不同文化阶段的边界和新文化阶段在发展进行中的宣告。目前，当今西方和世界仍处于人类历史上大规模文艺复兴控制中，媒介技术的发展引发了大规模的环境变化，当代文艺复兴的证据随处可见，我们文化、艺术和科学的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角落，目前都卷入了不断发现和再发现的发酵过程之中。今天的生活是不理性的、是千变万化的。处在不同文化阶段的边界上，新文化阶段也在进行中，只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因为，一般来说，文艺复兴是那些经历文艺复兴的人看不到的。电子媒介的存在和普及使这种发酵变得无形。从19世纪中期开始，新文化的诞生发展过程和不同文化的交替没有停止，由电子媒介引发的文艺复兴也没有减弱的迹象，相反，它显示了种种加速的迹象。这种加速与媒介技术有关。西方文化在今天转变的一个重要现象是，部落体验在大规模受众中的复兴。部落体验是媒介技术的发展，也就是电子媒介带来的，互联网技术让受众可以超越时空，同时在线并参与各种网络活动，为受众带来部落体验。公众阅读的大规模消失是印刷媒介的一个副作用，但是，电子媒介的同时性和参与性又诞生了大规模受众。

总之，电报技术引发的文艺复兴仍然笼罩着我们，20和21世纪影响我们的文艺复兴如此重要，并且无形；而这么大规模的媒介技术影响下的环境变化应该成为媒介环境学考察的客体，这就是埃里克指出的当今媒介环境学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不断加速的全球范围的文艺复兴正在进行，人们流动的全球游牧成为趋势，所有文化相互渗透，这些和其他所有的运动可以说都是环境变化，都是媒介环境学要关注

的问题，并且应该就媒介技术本身立刻得到讨论。

埃里克还谈到，环境学是研究包括所有自然环境和我们投放到土地、空气和水中的不同物质的科学，媒介环境学家要试图去理解包括本土和全球的污染等问题。然后，他引用了父亲的著名论断：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人类创造的媒介也是环境，不同的技术披着不同的外袍。马歇尔认为，应该在环境中理解新的或旧的媒介。任何新技术和人类官能的延伸或放大，当有了具体的物质呈现时，将趋向于创造一个新环境，这对衣服、演说、剧本和轮子都是真实的。关于这一点，诸多媒介环境学者或隐或显的思想是相同的，即媒介是环境，媒介塑造新环境，媒介是世界的延伸。所以，理解媒介就要理解研究媒介影响和塑造中的仍处于文艺复兴中的世界。

## 二、联系“决定因果”研究媒介技术，将导向“稻草人争论”终结

媒介环境学区别于传播学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研究的主要方面在于，媒介环境学研究的是媒介技术本身，其他两个学派研究的是媒介生产的内容。埃里克在父亲学术基础上的研究，也是研究媒介技术本身的。在斯特雷特看来，埃里克是媒介环境学一位重要的学术贡献者，或许他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在于他使得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决定因果观作为一种理解人类传播、创造性表达和技术创新效果的手段取得了发展。在父亲去世后，埃里克和父亲合著的《媒介和决定原因》出版，书中，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对人类活动和创造物的理解方式，一个比试图把这些现象嵌入简单的因果关系更有意义的方式。这最终将导向技术决定论“稻草人争论”的终结。<sup>6</sup>

那么，为什么说埃里克的研究，联系了亚里士多德的决定因果观并将导向“稻草人争论”的终结？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1. 埃里克分析说明了马歇尔的目标始终是探索、记录和解释文学和文化作品中决定原因的运作、创作过程，他对有效原因等其他原因并没有特别的兴趣。

媒介环境学研究的是媒介对人和社会影响的决定原因，而非唯一原因和所有原因。关于事物与原因，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四因说”：物质的（material）、最终的（final）、决定的（formal）和有效的（efficient），亚里士多德本人经常以艺术作品的创作为例，说明四种不同的原因，如在制作鞋子的过程中，物质的原因是鞋子是由皮革或兽皮制成的；有效的原因是鞋匠，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鞋匠将原材料转化为成品的行为；决定原因是指导工作的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被创造的事物的定义或类型，它开始是艺术家心中的一个计划，在作品的结尾以变形的材料作为其自身的内在形式出现；足部的保护是最终的原因或目的，即这双鞋就是

为了保护足部而制成的。

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经常讨论因果关系。但亚里士多德的“决定原因”被认为是被解释的最少和最不容易理解的，埃里克谈到，决定原因依然是个谜，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计划或蓝图。人们往往并不想知道任何事物的原因，人们不想知道为什么收音机让希特勒和甘地相似，也不想知道印刷术导致了什么后果。作为媒介的使用者，他们仅仅想参与其中。决定原因在这个时代仍然是巨大的神秘事物：受过教育的头脑发现它太矛盾和无理性。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是柏拉图（Plato）之后对决定原因表现出严肃兴趣的少有的人之一。英尼斯研究传播媒介有关的因果关系方面的开创性工作没有追随者，尽管他周围都是学术崇拜者。传媒专业的学生将会发现，在过去的500年里，西方科学通过简单的碎片化和量化过程，系统地排除了因果关系的研究。

埃里克还谈到，据他所知，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写决定原因的人，但是亚里士多德从来没有明确指出某事物的决定原因是产生它的基础，尽管他在很多场合都试图这么做。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决定原因时这样认为：决定原因是什么？是它的精华（essence）。埃里克认为，马歇尔和他合著的《媒介定律》一书也关注这一决定因果关系领域。他们的四定律使亚里士多德与时俱进，四定律分析的是主体力量的作用模式，提供了一种对（媒介进化）决定原因的分析，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而马歇尔持有的“媒介是一种无形的、始终存在的提供服务或损害的旋风”说的正是媒介作为决定原因影响人类。

也就是说，马歇尔和他的观点只是揭示出，技术对人类产生影响是因为技术本身是决定原因，但并不是说技术就是唯一的原因和所有的原因，还有其他原因。而且，马歇尔对其他原因没有特别的兴趣。埃里克（2005）这样解释道：

让我在此说明一下对麦克卢汉与某种形式的决定论有关的非难。麦克卢汉的目标始终是探索、记录和解释文学和文化作品中决定原因的运作、创作过程。他对有效原因或最终原因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两者都以其自身的方式属于‘决定论’的范畴，而且两者都是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的关注点<sup>7</sup>。为什么辩证法的逻辑论证和决定原因相处起来这么困难？可能是因为决定原因是非理性的，而辩证法首先是理性的。决定原因还有其他辩证法不欢迎的属性：它不是连续的按照时间发生顺序排列的，它在时间之外活动。它和辩证法没有关联点，因此，它不属于辩证法的范围，也不围绕辩证法或和辩证法相关。决定原因像是一个局外人……



也就是说,决定原因对于辩证法专家来说毫无用处,它不提供思维的东西,也解决不了他们的任何问题。它既不回答也不提问任何适应辩证法专家接纳处理的问题。

关于埃里克和决定原因,有趣、可以理解而又难以理解的一点是,埃里克对亚里士多德既结合(结合他的四因说),又反叛(又将决定原因置于逻辑之外)。埃里克指出,决定原因是辩证法的局外人,产生于语法和修辞(grammar and rhetoric)最基本、最深刻的地方。斯特雷特在分析埃里克的学术时则说,决定原因是对逻辑的反叛,埃里克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非亚里士多德式的亚里士多德。

2. 对马歇尔及其他媒介环境学派学者们是技术决定论者的认知和批判,是先歪曲地认知了马歇尔等人的观点,将马歇尔等人歪曲地设定为一个技术决定论者,然后再攻击这个已经被歪曲了的观点。

斯特雷特在《媒介和决定原因》一书的序言中称,马歇尔和其他媒介环境学者被作为技术决定论者受到批判。实际上,技术决定论是未经应有的考虑加到媒介环境学者身上的词汇,像“原因-结果”这样的语言容易因为习惯、惯常活动混进来并被应用。所以,我们应该结束类似这样的“马镫引起封建主义”的速记法引起的争论。这样的语言是一种速记法,类似诗歌,用来描述更为复杂的过程。这个更为复杂的过程可以用“决定原因”来表述得更好,而不是用“原因-结果”可以表述清楚的。“决定原因”是具有突然性质和涌现性质的,是媒介环境学者在考虑技术变化对个人和社会影响时候想到的因果关系。埃里克将媒介技术和亚里士多德的“决定原因”联系在一起分析,从而指出了马歇尔对技术对人类和社会影响的作用是一种“决定原因”的分析,而不是导致结果的“所有原因”的分析。“决定原因”不应该被速记法“原因-结果”这样简单、武断地概括为技术是导致对人和影响的唯一和所有原因。

总之,“稻草人争论”是指当想证明一个的观点或论点优于相反的观点时,先歪曲对方观点,然后攻击这个被歪曲的观点。那么,对“被歪曲”的观点的批判自然是不成立了。埃里克通过联系亚里士多德的决定原因,说明了媒介环境学者们观点并非是简单武断的技术决定论,因而导向“稻草人争论”的终结。如斯特雷特所谈,类似这样的“马镫引起封建主义”的速记法引起的争论应该结束了。可以说,说“媒介环境学者是技术决定论者”就像说“马镫引起封建主义”“技术造就历史”一样,是简单武断的。

埃里克联系决定原因的思考,不仅是对亚里士多德决定因果关系在媒介技术环境中与时俱进的结合,也是对马歇尔学术研究、乃至媒介环境学研究的突破。对

他学术观点发表时期（2005）的媒介环境学主要代表学者来说，这种研究也是新鲜的。斯特雷特谈到，马歇尔的《理解媒介》是20世纪最重要的书籍之一。而对于任何想要了解事情真正是如何运作的人来说，《媒介和决定原因》是21世纪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可以说，这本小书提供了对“决定因果”的广博的理解。马歇尔写的三篇文章，和埃里克写的一篇强有力的新文章给陈词滥调赋予了新含义。“有其父必有其子”，当我们阅读那些引人入胜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章时，我们发现“决定原因”并不是你所想的那样，但这对你如何思考至关重要。美国新泽西理工学院大卫·罗森伯格（David Rothenberg）教授谈到，在《媒介和决定原因》这本书中，埃里克更新了他父亲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而这一点常常被忽视，这就是因果关系在理解新媒体如何改变我们的环境和沟通方式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莱文森（Paul Levinson）认为，这本书是充满智慧和洞察力的四重奏，它捕捉并延伸了一种仍然是典型的、独特的媒介思考方式，它通过与古代世界相联系的模式和联系，为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增色。有评论者指出了埃里克的成就，美国爱默生学院托马斯·库珀（Thomas Cooper）教授认为，在本书中，没有人能比马歇尔的信徒儿子埃里克那样，更好地揭示出数字环境中对决定原因的理解。

### 三、积极参加学会事务，号召媒介环境学者立即行动

1998年9月4日，媒介环境学会（MEA）在美国成立。埃里克作为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媒介环境学家，尽管没有担任过MEA的会长或副会长，但作为MEA普通会员的他，积极参加学会事务。<sup>8</sup>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身体力行参加学会活动，他是数次MEA年会的重要发言人，也是MEA会刊《媒介环境学探索》编辑委员会成员。由于他对MEA发展的突出贡献，他获得了很多奖项，如2007年他在媒介环境学会公共知识分子活动中获得了尼尔·波兹曼职业成就奖。<sup>9</sup>

埃里克总是通过媒介环境学会组织的会议、发行的期刊等平台，与媒介环境学领域诸多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融洽地互动，对他们的研究做出积极评价，赞誉学者工作的意义，如他认为托马斯·法雷尔（Thomas Farrell）的作品《沃尔特·翁对文化研究的贡献：现象学和世界 我与你的传播》（Walter Ong's Contributions to Cultural Studies: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Word and I-Thou Communication）是一本（态度）谦虚的书，法雷尔为文化和传播领域的学术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读者通过阅读可以对翁的整体洞察力范围有好的感知。再如他谈到，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研究，我只举几个例子：默雷·夏弗（Murray Schafer）的《世界的

调音》(The Tuning of the World)将对音乐家和作曲家的训练拉离音乐厅,走向了大环境;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如1961年、1969年、1984年)从媒介环境角度研究城市的动力;英尼斯和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的作品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开启了必须的研究路径;马瑞林·埃梅里(Merrellyn Emery)关于电视影响的研究使用了“群体智慧”:她回顾了所有的电视和图像显示终端的效果研究成果,然后揭示出电视是一种“不利于适应的媒介”;特德·卡彭特(Ted Carpenter)在北极北部和现在的北美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也是基于MEA这个全球第一的媒介环境学学术共同体平台,埃里克发表文章专门讨论媒介环境学,指出了媒介环境者需要立即采取的三项行动:

一是通过训练我们的感知、批判性的意识,以及研究每种文化的艺术怎么使一种反应系统适用于探究文化和感知变化(像雷达站或地震仪的远程预警线),以从艺术中汲取一切。在每一项新技术发布之前,都要对其进行检查,就像药物在被宣布可以为公共使用或消费安全之前被研究,直到被研究和确认无毒,至少对我们自己的文化来说是这样。

二是对于所有不同文化和社会中的所有新旧技术和它们的媒介环境,组织项目去研究效果,尤其是副作用研究。需要记录不同媒介对不同文化的反应,并且学会预测新媒介可能带来的效果。

三是设计和实施带有控制(目的)的研究,让对某种文化无害的新媒介不会影响另一种文化的幸福感,不至于让另一种文化可能发现它的危害和毒性。这是出于为地球上的人受益的考虑,这样做的结果无疑会对一种技术或媒介形成暂时的压制,并且可能会持续监测被包含在每一种环境“气象”中的文化,也可能会对综合环境做周期性监测。

在指明了媒介环境学者要立刻行动起来的三项内容基础上,埃里克充满激情地对学者们发出号召,号召媒介环境学者面向未来,他(2006)说:“如果你真的是媒体环境学者,这(三项行动)就是你的未来,应该也是你的现在。”他(2006)呼吁,环境学不是一项观赏性的运动。俗话说,在太空船地球(地球像宇宙飞船,依赖自身具有的有限资源生存)上只有工作的船员,没有空间留给乘客。请停止空谈,开始成为媒介环境学家,冒险走出象牙塔,进入控制塔。

#### 四、学术人生堪称独特,给研究者们带来启示

埃里克的学术人生可谓独具特点,首先,埃里克知识广博,在其他学者研究基



础上开拓创新，有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是，他的学术人生又与父亲的学术人生息息相关、不可分离。如果没有马歇尔在传播学界的成就和声望，不会有埃里克的举世瞩目。从这个角度看，应该是父亲马歇尔成就了埃里克的学术生涯；其次，埃里克的学术身份特殊，他是著名的“讲师”，直到逝世，也没有获得“教授”这样的学术职务，从这个角度看，可能是父亲马歇尔影响了他的职业身份方面的晋升。就埃里克的学术成果和经历，可带给学者们如下启示：

1. 创新想法和独特的学术成果是一个学者学术生命的命脉。

尤其是名师的学术继承人，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师长卓越的成绩在给后人带来正面影响的同时，也可能会遮蔽后人的学术成就，影响世人对其学术成果评价的客观性。

在MEA通知埃里克去世的邮件中，通常使用“Dr.”而非“Professor”来介绍埃里克的身份，在埃里克本人的简历中，他也只是自称是“一位在传播学和媒介方面国际知名、获奖的讲师（lecturer）”。这是因为，埃里克虽然有博士学位，但他并没有学术职位的任命，他并不是教授。通过前文的论述不难看出，埃里克是有自己的创造性学术成果的。如果他不是马歇尔的儿子，可能反而可以顺利晋升为教授。人们往往只会注意到他父亲的光芒和成就，仅仅将他的研究看作是他父亲思想的一种延续和宣传，似乎离开了马歇尔，埃里克的学术研究就不值得深究、无甚可谈。

然而，这种态度可能是失之于草率的，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例如，在《媒介和决定原因》这本书中，前三章中除了第二章中包含有马歇尔和巴林顿·诺维特（Barrington Nevitt）合作的内容，其他是马歇尔的作品，而第四章则是埃里克的独立作品。而且这一章被斯特雷特认为是对他父亲和媒介环境学研究具有主要突破意义的一章；再如，《媒介定律：新科学》一书是马歇尔和埃里克合著的，不仅有英文资料显示媒介四定律是两个人共同提出的，也有中文资料说明了这一点，如埃里克（2015）曾谈：“正是出于与时俱进的目的，我们写作了《媒介定律》”“正如我在《媒介定律》的导言中所述，我们找到了四种。”遗憾的是，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在谈到“天鹅绝唱”“媒介四定律”时，提到的往往只是马歇尔，忽略了埃里克。

2. 媒介环境学、传播学学术研究中，研究学者的范围要拓宽、对学者学术内容的研究要加深，不然可能会错过“学术采矿”的机会。

国内学界现在对西方研究工作的译介、评价、吸收、反思在发展中，对媒介环境学派学者的认知和重视也在逐渐增加，但是，目前国外国内对媒介环境学派学者与技术决定论的关系认知上仍然是有分歧和偏见的，而通过上文的研究，可见这个

问题的论争是应该被埃里克的成果终结的。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在国内传播学界取得共识，对媒介环境学在国内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可以结束对媒介环境学者研究立场和内容的“就是技术决定论”的武断界定，也可以助力于结束对媒介环境学派诸如“就是在三尺深的矿井中挖掘”的“三尺矿井挖掘”论的立场。

埃里克的学术成就和他父亲马歇尔相关，也和其他学者如亚里士多德等相关。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研究的学者范围宽广，从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到古典学家哈弗洛克，再到城市规划学家雅各布斯……这也是他能取得学术成就的原因之一。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传播学研究过程中，研究学者对象范围方面要宽，内容方面要深，以便于多角度充分研究，助研究者取得成就。

就媒介环境学研究而言，对国外媒介环境学者研究在面上需要进一步拓宽，在内容上需要进一步加深，以促进我国传播学三大学派共同繁荣发展。在西方，现在活跃的媒介环境学者有斯特雷特、莱文森、林文刚和一些加拿大的学者。虽然国内也有过研究马歇尔的热潮，但总体上看，国内研究媒介环境学的学者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相比国外的媒介环境学研究景象，国内的研究情况可谓寂寥。虽然，国内传播学界近年来肯定并尊重马歇尔的学术成就和地位，对马歇尔的研究也呈繁荣状态，但是，国内学界往往是把他作为一位传播学大师来研究讨论，并没有在广泛范围内将他认定为是属于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

总之，不管国内外学术界对麦克卢汉父子的争议有多么激烈，无可否认的是，他们都是媒介环境学研究的旗帜性存在。而埃里克在延续继承其父亲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也做出了自己独创性的学术贡献，学界有必要对其学术成果给予更多的关注、研究和借鉴。

（责任编辑：胡宏超）

### 注释 [Notes]

1. 根据2018年5月27日MEA（媒介环境学会）发给会员的通告埃里克·麦克卢汉逝世的电邮。
2. 根据2018年6月7日作者对美国福特汉姆大学教授兰斯·斯特雷特的电邮访谈。
3. 根据2018年6月5日作者对美国威廉·帕森特大学教授林文刚教授的微信访谈。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formal cause的意思是决定某件事物的模式（the pattern that determines the form taken by something），所以本文没有按照中文字面意思将书名翻译为《媒介和正式原因》。
4. 根据2018年5月27日MEA（媒介环境学会）发给会员的通告埃里克·麦克卢汉逝世的电邮。
5. 16世纪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的这个词汇实际上是19世纪的发明，显然，需要两个半

世纪后，人们才从（文艺复兴）这种震惊中恢复过来，并给它创造一个词汇。

6. 根据2018年6月1日MEA（媒介环境学会）发给会员的通告埃里克·麦克卢汉逝世的另一封电邮。
7. 请注意《媒介定律：新科学》书名中的“新科学”三个字。埃里克谈到，《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曾被批评家们指责过是“充斥着错误”“不科学”“语无伦次”。当《媒介定律：新科学》问世时，批评家门有一次忙碌起来，宣称并不赞赏这本新书。几乎所有批评家都未曾注意到，这本书是具有科学性的，不过并非建立在常规科学的基础上。这本书和《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都不能被视为正统的科学，因为它们都不是源于任何当下的或是先前存在过的理论或理论体系。
8. 根据2018年5月27日媒介环境学会通告埃里克·麦克卢汉逝世的电邮。
9. 根据2018年5月27日媒介环境学会通告埃里克·麦克卢汉逝世的电邮。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埃里克·麦克卢汉（2015）。《理解媒介》的世纪延伸（王蓓译）。《中国图书评论》，（1），22-23。
- 郭镇之（1999）。关于麦克卢汉的思想——与埃里克麦克卢汉博士的一次访谈。《现代传播》，（4），16-18。
- 梁颐（2013）。媒介环境学者与“技术决定论”关系辨析。《新闻界》，（19），1-8。
- Liang Yi. & Albercht, R. (2018). Extending McLuhan. *Explorations in Media Ecology*, 17(2), 173-178.
- McLuhan, E. (2002). Reviews. *Explorations in Media Ecology*, 1(2), 151.
- McLuhan, E. (2005). On Formal Cause. *Explorations in Media Ecology*, 4(3-4), 96-200.
- McLuhan, E. (2006). Concerning Media Ecology. *Explorations in Media Ecology*, 5(3), 185-196.
- McLuhan, M. & McLuhan, E. (2011). *Media and Formal Cause*. Houston, TX: Neo Poiesis Press.

## 更正

由于排版错误，本刊2019年第9期出刊的封面文章中出现一篇与该期目录无关的文章标题《“网络化病人”：互联网对患病行为的影响研究》。由此给读者阅读带来的不便和困扰，我们深表歉意。

特此订正！

《国际新闻界》编辑部

2019年10月25日